

(第三辑)

后哲学文化

●[美]理查德·罗蒂著

●黄 勇编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后 哲 学 文 化

〔美〕理查德·罗蒂著

黄 勇 编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上海百科排版印刷厂印刷

开本 350×1168 1/32 印张 10.625 插页 4 字数 224,000

1993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000册

ISBN 7-5327-1167-6/B·065

定价：6.20元

内 部 发 行

(沪)新登字 111 号

译者的话

罗蒂实用主义的后哲学文化观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凯南人文科学讲座教授理查德·罗蒂现在已被公认是当今美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虽然其在哲学界的地位早在其编辑后来产生巨大影响的文集《语言学转折》(芝加哥,1967年)时就已确立了,但他的哲学之特别受到人们重视,是由于其在美国甚至整个西方哲学界和人文学领域引起巨大震动的《哲学与自然之镜》(普林斯顿,1979年)以及随后所作的一系列讲演和发表的论文。这些讲演和论文中有些已编入《实用主义的后果》(1982年,明尼阿波利斯)、《偶然性、讥讽和亲和性》(英国剑桥,1988年),以及现在正在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他的两卷论文集:《客观性、相对主义和真理》与《论海德格尔和其他》。本中文文集由

编译者同作者经过仔细讨论，从他最近几年撰写的文章和所作的讲演中挑选汇集而成，其中有相当数量是在这里第一次发表。目的是想用有限的篇幅反映作者的主要思想，特别是其自《哲学与自然之镜》以来的思想发展。

罗蒂的哲学生涯是在实证主义具有压倒优势的气氛中开始的，而且通过其编辑上述的《语言学转折》和为该书撰写的长篇导言及在同期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他自己也曾经是这个运动中的一个佼佼者。但后来，他却逐渐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成了这个运动的批评者。而且事实上，罗蒂所批判的远不只是分析哲学运动，而是一个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传统：寻求超越意见的真实知识，发现现象背后的绝对实在。如果说启蒙运动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后神学文化的话，那么对这个柏拉图主义传统的超越将会导致一个后哲学文化。在这样一个后哲学文化中，将不再有人对这种绝对实在和这种绝对实在的表象感兴趣。而在罗蒂看来，在促成这样一种文化的到来方面，实用主义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实用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反本质主义和反表象主义。而正是在这种反本质主义和反表象主义的意义上，罗蒂把人们一直以为是在唱对台戏的欧洲大陆哲学与

英美本土哲学结合起来了：尼采与詹姆斯、海德格尔与杜威、德里达与戴维森，等等。也正是在这种反本质主义与反表象主义的意义上，罗蒂没有完全否认分析哲学。因为正如他在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的，这个运动由于其内在的辩证过程，正在越来越偏离其出发点，发展出了一种与柏拉图主义相反的东西。

因此可以说，实用主义的后哲学文化观是罗蒂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思想，同时也是体现在本书各篇中的一个主线，因而也是本序言想力图阐明的一个基本概念。在下面几节中，我将首先分析罗蒂实用主义思想产生的背景，即今日美国新实用主义思潮的兴起，然后阐述罗蒂实用主义的几个基本思想，其后哲学文化概念的内在隐含，最后讨论他对自己这种观点的一种自我维护：种族中心主义。

一、今日美国新实用主义的兴起

毫无疑问，从皮尔斯开始至杜威达到顶峰的美国实用主义已经成了美国文化的哲学。事实上，美国哲学通常是与实用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连海德格尔也注意到，美国人对美国主义的解释是实用主

义。^①但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可以发现，从其产生之日起，实用主义就从来没有在美国取得过支配地位。即使在其鼎盛之日，老式的唯心主义和新式的自然主义也一直垄断着各主要大学的哲学系。但无论如何，在此期间，实用主义还是很有活力的哲学派别。而在杜威死后，实用主义虽然作为一种立场还被保存着，但很少有美国人会为此而感到骄傲了。詹姆斯和杜威的大多数追随者不再是有影响的专业哲学家。而专业哲学家们则在实用主义对符合论真理观的拒绝中看到了其相对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和虚无主义的隐含而转向别的哲学立场。

实用主义在杜威以后的式微，首先是因为实用主义强烈地反对哲学的专业化，而二次大战后的一个时期正是哲学的专业化时期。这个时候，哲学家们不是把自己的专业与神学相联系（像一次大战之前那样），也不是与社会科学联系（像实用主义的鼎盛期那样），而是与数学和自然科学相联系。总之，人们认为哲学应当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这就使实用主义很难完全进入学术界。与此相关的第二个原因是，由罗素和怀特海的《数学原理》倡导的在符号

① 海德格尔：《有关技术的问题和其他论文》（纽约，1977年），第153页。

逻辑中的革命和对符号逻辑的入迷使专业哲学家们把注意力转向实用主义未曾讨论过的问题。因为除了皮尔斯，经典实用主义者们主要关心的不是理论构造而是实际行为，不是形成一般的原则完成神圣使命，而是运用独特理智解决社会问题。当然另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是，为逃避纳粹迫害，欧洲特别是德国和奥地利的许多哲学家，如卡尔纳普、赖辛巴赫、塔斯基和亨普尔等，纷纷移居美国，从而也把一种纯粹、严格和精确的精神带进了美国哲学舞台。很快地，逻辑实证主义便牢牢地控制了美国主要大学的哲学系，并支配了整整一代年轻人的想象力，而实用主义在他们眼里成了模糊的头脑不清的哲学。^①

但在最近，实用主义又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复兴。虽然这还不能与其从皮尔斯到杜威的鼎盛期相比，更不能说支配了美国哲学界，但它确实不像在逻辑实证主义占有压倒优势地位时那么默默无闻甚至成为否定性的东西。这种复兴的一个迹象是，许多今日最重要的美国哲学家往往不那么犹豫地乐于接受人们对他们的实用主义称呼，即使他们自己可能更

① 关于美国实用主义的兴衰，见韦斯特的《美国人对哲学的回避：实用主义的谱系》（麦迪逊，1989年）。

情愿被称为别的什么主义，而且即使事实上他们的思想可能与实用主义还有一段距离。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并不十分惊人却也绝对不容忽视的实用主义复兴并不限于哲学界。像伦特里希和菲什这样的实用主义文学批评家使传统的人道主义者感到了不安；像沃林和沃尔泽这样的实用主义政治理论家，则由于提出了更激进的政治思想而使传统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受到了挑战；而像斯托特和考夫曼这样的实用主义神学家则正在改变流行的宗教观念。

我们再把视野收回到哲学的实用主义上来。实用主义在美国哲学中的复兴，或者说新实用主义哲学在美国的兴起，主要是由于实证主义的分析哲学走到了尽头。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贡献是揭示了许多传统哲学问题的虚假性。但这一点现在已经成了老生常谈了。“哲学家们想做些新的事情。通常，在其启示的源泉干枯的时候，英语世界的哲学家们总是面向欧洲大陆，寻找新的思想，而他们在那里发现的东西正是杜威曾经期望的。”^①例如，在哈贝马斯和福科这样的哲学家那里，他们发现了对社会政治问题而不是数学和科学问题的关心；而在像德里达

① 罗蒂：《实用主义的后果》，（明尼阿波利斯，1982年），第76页。

这样的哲学家那里，他们看到了哲学与小说、电影和戏剧等的关系。而这些正是杜威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预计会在美国出现而实际上没能出现的：“如果我对时代的征兆理解不错的话，当社会科学和艺术的重要性成了人们反思的对象（就像数学和自然科学在过去成为人们思考的对象那样）的时候，在其全部的意义得到把握的时候，一场新的整合运动将在哲学中出现。”^①另一方面，在所有这样的哲学家那里，他们也都看到了一种对传统形而上学二元论、实在论和表象论的反动，而这也正是美国经典实用主义的一个鲜明特征。因此，今日美国实用主义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企图把美国哲学与大陆哲学在实用主义的主题下联合起来，如像伯恩斯坦和罗蒂所做的。这些人往往比较注重社会政治问题；一是用实用主义的灵感改造分析哲学，使之摆脱实证主义的穷途末路，如像蒯因、戴维森和普特南所做的。这些人虽然主要关心的还是思想与语言，但如罗蒂在引言中所指出的，就其并没有赋予自然科学任何特殊地位而言，已与实证主义根本不同了。

毫无疑问，在使实用主义在美国哲学舞台上起

^① 杜威：“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载伯恩斯坦编：《杜威论经验、自然和自由》（纽约，1960年），第18页。

死回生方面，蒯因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这主要不是由于其与实用主义的谱系关系：1931年他聆听了杜威在哈佛所作的第一个詹姆斯讲座，而在1968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作了第一个杜威讲座。这更主要地是由于他对实用主义的实际贡献，并使人们重新对实用主义哲学产生兴趣。蒯因在杜威去世前一年半发表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被认为“可能是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哲学论文”。^①而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蒯因重新举起了实用主义的大旗。逻辑实证主义一方面坚持分析真理与综合真理的区分，另一方面又相信所有有意义的陈述都可以还原为经验命题。经验主义的这两个教条都服务于其想为科学与形而上学分界的目的。“在拒绝这样的界线的时候，我倡导一种更彻底的实用主义。每一个人都被赋予科学的传统和一系列连续的感觉刺激。指导他使科学传统与其连续的感官刺激适合的各种考虑，只要是理性的，就是实用主义的。”^②

但蒯因对实用主义的更系统阐述是其“经验主

① 多那根：“评爱德华编《哲学百科全书》，载《哲学评论》，1970年1月号，第91页。

② 蒯因：“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载《从逻辑的观点看》（纽约，1963年），第46页。

义中实用主义者的地位”一文。蒯因认为，在后休谟的经验主义中，有五个进步与经典实用主义直接相关。第一是方法论的唯名论。根据这种理论，在认识论中，要尽可能地讨论语言表达而不是观念；第二是本体论的脉络主义。它主张，要想得益于一个方便的、但本体论上带来麻烦的术语而又否定其指称，我们必须依赖于脉络定义；第三是认识论的整体论。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相当广泛的科学理论整体，而不是一个句子甚至一个语词，才可以成为表达意义的单位；第四是方法论的一元论，即蒯因在“两个教条”中所强调的要放弃分析—综合的二元论；最后是方法论的自然主义：放弃先于科学的第一哲学的目标。蒯因认为，这最后一点，对于实用主义来说，也是最为重要的。因为正是在这里，尽管依旧奉行“我”的自然主义，但其中的我却走到了实用主义的人道主义立场：“我必须要承认，科学理论的系统结构是人造的。是的，它是用来适合感性材料的，但它是发明的而不是发现的，因为它并不是完全由材料决定的。所有别的系统，所有我们做梦也没想到的系统，也都可以与这个材料相适合。”①

① 蒯因：“实用主义者在经验主义中的地位”，载麦万尼编：《实用主义：来源及其展望》，（南加州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23页。

蒯因最重要的追随者、现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的戴维森恐怕是一个最有影响但又不愿被称为实用主义者的实用主义者。其主要著作《真理与解释研究》就是献给蒯因的，并说“没有他就没有本书”。他在1989年11月哥伦比亚大学第6次杜威系列讲座（蒯因在1968年作了第一个杜威系列讲座）开讲第一句话也许说明为什么人们要把他归为实用主义者：“如果没有可以思想的造物，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没有任何对象或事件，可以是真的或假的。”^①也许戴维森做出的对实用主义的最大贡献是他在蒯因拒斥了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以后，诊断出了经验主义的第三个而且在他看来是最后一个教条（因为在抛弃了这样一个教条以后，在他看来，似乎就不再有什么东西是为经验主义所特有的了）。这就是模式与内容的二元论。例如康德的先天范畴和后天经验就是这种二元论的一个例子。而实证主义的意义与信念之区分又是这个教条的另一个例子。在这种二元论中，模式通常被认为是独立于内容的，因而不会因内容的改变而改变。而在戴维森看来，模式与内容是不可分的，因为它们相互依赖的。例

① 戴维森：“真理的结构和内容”，载《哲学杂志》，1990年6月号，第279页。

如“信念与意义的相互依赖源于解释语言行为的这样两个方面的相互依赖：赋句子以信念和解释句子……显然我们必须有一个理论同时能够说明对待语言的态度和解释语言的理论，而这个理论本身并不假定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①

戴维森理论中与实用主义有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在真理问题上的“没有对质的符合论”。戴维森反对传统真理符合论，因为这种理论认为真理需要与外在世界对质，而这种对质在戴维森看来是荒唐的。事实上，戴维森持的是一种与传统符合论相反的融贯论。他的一篇著名论文的题目就是“一种关于真理和认识的融贯论”。只是他认为，支持这种融贯论的根据不但不排斥符合论，而且会产生符合论。因为“纯粹的融贯不能保证一个人相信的东西”^②。这里还需要符合。当然外在世界不能作为一个立场使信念与之符合。但还是有信念可以与之符合的立场。这就是彻底的解释者的立场（类似蒯因的彻底的翻译者）。“关于其什么时候同意句子，即什么时候认为这些句子为真，说话者不能系统地蒙骗其可能

① 戴维森：《真理和解释研究》（牛津，1985年），第195页。

② 戴维森：“真理与认识的融贯论”，载亨利希编：《康德还是黑格尔》（斯图加特，1983年），第424页。

的解释者。因此原则上,意义及信念(就其与意义有关而言)都是受到公众决定的。”^①显然,戴维森的这种关于真理的没有对质的符合或产生符合的融贯说,从根本上说,与罗蒂和哈贝马斯的对话共同体理论是一致的。可能正因为这样,戴维森承认,在1982年底美国哲学年会太平洋地区分会上,罗蒂成功地说服了他不再用符合论或融贯论来称呼自己的理论。据说作为回报,他也成功地说服了罗蒂放弃其实用主义的真理理论。^②

与上面两位哲学家不同,现在哈佛大学哲学系的主力之一普特南则在近来越来越乐意被称为实用主义者。在其最近出版的《带有人面的实在论》一书的导言中,他说,他现在认识到,他以前(甚至一直到现在为止)笨拙地在实在论名义下从事的研究如果是在实用主义的名义下进行也许会要好得多。普特南在此提到的这种研究是指他最初在《理性、真理与历史》中阐述的与形而上学实在论或外在论实在论相反的内在论实在论,或者说与来自上帝的观点的

① 戴维森:“真理与认识的融贯论,”载亨利希编:《康德还是黑格尔》(斯图加特,1983年),第432页。

② 戴维森:“真理的结构和内容”,载《哲学杂志》,1990年6月号,第392页注40。

实在论相反的来自人的观点的实在论。根据前一种实在论，世界由独立于心灵的东西组成。对于世界的实际样子，可以有一个而且只能有一个真实而又完全的描述。真理是语词或思想-符号与外在世界的符合。这是一种上帝的观点，因为只有上帝，一个超然于人和世界之外的超越存在物，才可以作这样一种比较，才知道是否有此符合。但我们是人，而不是上帝，因此只有资格提出一种内在的实在论。根据这样一种实在论，“只要对象与怎样使用符号和如何使用符号是没有关系的，符号就并不必然地与对象符合。但实际上由特定使用共同体以特定方式使用的符号确实与在这些使用者的概念模式之内的对象符合。‘对象’并不独立于概念模式而存在。当我们引进某种描述模式时，我们就把世界划分成对象。由于对象和符号同样内在于描述模式，就有可能说什么与什么相匹配。”^①

虽然在《理性、真理与历史》这部著作中，普特南还认为，曾被用来称呼这种内在实在论的“实用主义”，同“融贯真理论”、“非实在论”、“证实论”、“多元论”等标签一样，由于其历史上的其他用法，具有不

① 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剑桥，1981年），第62页。

能令人接受的隐含，但后来，他却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这种实在论应当更恰当地称为实用主义的实在论。因为一方面，这种实在论强调的是，我们不能认识也不能有用地使用上帝的观点。所存在的只是我们实际的人的各种不同观点，而我们这些实际的人所考虑的是我们的描述和理论为之服务的各种利益和目的。另一方面，“实用主义（詹姆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如果不是皮尔斯的实用主义）的核心，在我看来，就是坚持行动者的观点的至高无上性。如果我们发现，在从事广义的实践活动时，我们必须采取某种观点，使用某个‘概念系统’，那么我们必须同时进一步主张，这实际上不是事物本身的样子”^①。这样，他便发现，实用主义可以更好地表达这种实在论观点。

一个更为自觉的实用主义者是曾任美国哲学学会东部分会主席的理查德·伯恩斯坦。他的一个重要论文集子《哲学面面观》的一个副标题就是“带有实用主义语调的论文”。伯恩斯坦本人的兴趣是要发展一种以亚里士多德为基础的实践哲学。在他看来，实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广义上是指一般的生命活动，而在狭义上是指自由人的生活方式，指的是支

① 普特南：《多面实在论》（拉萨勒，1987年），第17页。